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

第八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

第八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李勇先主編.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第八編)

ISBN978-7-313-05503-3

I. 類... II. 李... III. 歷史地理—文獻—匯編—中國—古代 IV. K928.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57133 號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第八編 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共二十三冊)
李勇先 主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200030)

電話: 64071208 出版人: 韓建民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安徽省儒林圖書有限公司經銷

開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張: 744.5 字數: 18980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13-05503-3/K·060

定價: 16100.00圓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全套拾編 柒拾冊

定價: 肆萬玖仟圓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學術顧問·葛劍雄

統籌·陳建華

辛德勇

劉邦權
施維

主編·李勇先
副主編·毛麗婭

《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

主編 李勇先

副主編 孫勃 葛麗平

編委(按姓氏筆劃爲序)

毛麗婭 王川 王開隊 王小紅 王會豪

王文江 甘露 石芳 付天星 李玉

李勇先 李晶 李中鋒 李榮慧 胡堯

郭建強 姚雨露 高順祥 高羽 梁欣

張寶見 張海鵬 張鯤 張鳳雲 孫吉

孫勃 覃影 程勵 粟品孝 湯銳

葛麗平 溫德強 韓意 羅勇超

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任 韓建民

副主任 張天蔚 陳建華

委員 劉邦權 任雅君

汪啟明 施維

責任編輯 李陽 陳建華

裝幀設計 倪宇峰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序·葛劍雄

至遲在戰國時期，流傳至今的中國第一篇地理著作《禹貢》已經問世。兩千多年來，各類地理著作構成了中國典籍的重要部分。在傳統的四部分類中，史部專門設有地理類。單篇的地理著作更多，尤其是清代乾嘉學者，幾乎都曾從事地理考證，留下豐富的成果。散見于其他古籍中的地理資料更浩如煙海，廣泛存在于經部、子部和集部之中。在八千多部地方志中，地理資料也佔了很大部分。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基本延續、覆蓋面廣的歷史資料，是中國歷史地理學最珍貴的、不可或缺的资源，為全方位地開展歷史人文地理和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優越的條件。一般來說，由於自然地理現象的變化比較緩慢，必須有長時段的觀察或觀測記錄，方能進行研究。而研究的時段越長，就越有可

能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例如，對氣候的變遷，根據中國從甲骨文開始的文獻記載，就能得出在以往的三四千年間已經發生過多次寒暖交替變化的結論。又如，根據東周以來的文獻資料，可以復原出黃河下游河道的幾次主要的改道。但對只有數百年史料記載的區域來說，氣候的變遷或許尚未完成一個完整的周期，有限的事實自然無法推導出可信的結論，更難由此探求未來變化的規律。在一個較短的時段內，或許根本沒有發生一次河流改道，豈能由此判斷黃河下游的變化規律？

就是對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中國古籍中極其豐富的資料也具有舉世無雙的優勢。儘管這些史料大多缺乏精確的數據，也未必符合現代地理考察或抽樣調查的要求，但內容的多樣、題材的廣泛和描述的細緻，足以彌補這些不足。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研

究能够開創如此多的分支，運用現代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取得引人矚目的成果，不能不歸功于這一有利條件。

中國古籍中的地理專著，包括正史的地理志（郡國志、州郡志）、地理總志、專志，已有浩繁卷帙。不過由於內容集中，且大多數已整理出版，較易收集。但散見于其他書籍中的資料就不易查找，而且往往被忽略。如查閱《四庫全書》的人，一般不會漏掉史部中的地理類，却未必會注意在經部、子部、集部中的地理資料。清代學者曾大力輯佚，將散見于古籍中的文字，無論是整篇整段，還是片言只語，巨細無遺，分書彙集，貢獻甚大。但如果能够將那些分散的歷史地理資料彙集起來，同樣是歷史地理學者和相關的專業人士所期待的。

四川大學李勇先教授經過長期努力，編成《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七十冊，完成了本學科這項最巨大的資料彙編工作，其價值不言而喻。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以支持學術、服務社會爲己任，及時予以出版。我有幸事先翻閱，並得與勇先教授討論，一得之見亦蒙採納。是以不揣淺陋，寫下這些話，就教于學術界同仁，也樂意作爲本書的推介。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

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葛劍雄

二〇〇八年十月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序：辛德勇

時常會遇到一些不太瞭解歷史地理學具體研究狀況的文史學人，詢問從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是不是主要依賴各種古代地理志書。人們提出這樣的問題，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現狀缺乏足夠的瞭解。

中國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直接脫胎於傳統的沿革地理。顧名思義，所謂沿革地理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政區置廢、地名更易和疆界展縮之類的問題，而傳世古代地理志書的絕大部分內容，便是記錄上述地理要素，因此，在沿革地理學的研究當中，一直是以古代地理志書作為最基本的核心史料。從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對傳統沿革地理研究的繼承性角度看，上述沿革地理內容，至今仍然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研究相關問題時，確實還很需要依賴這類地理志書。然而，隨着中國歷史

地理學的創立和不斷發展，時至今日，它的研究範圍，早已大大超越於沿革地理之外，涉及到諸如氣候、植被、動物、土壤、水文、農業、礦產業、製造業、交通、城鎮、聚落、人口、政治、軍事、文化等衆多現代地理學構成要素。研究這些內容所使用的史料，自然不能僅僅局限於古代地理志書，其中有些問題，甚至有可能根本不再需要直接閱讀這類專門的文獻，而是要另行搜檢其他門類的史籍。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具體問題的文史學者都有實際體會，不管哪一學科或是哪一專門領域，要想在前賢時彥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得出富有價值的學術創見，都不能只是簡單地瞭解、閱覽和利用某一單一種類的最直接史料，歷史地理學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傳統沿革地理研究的代表性著述，如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閻若璩的《四書釋地》、

胡渭的《禹貢錐指》、全祖望的《漢書地理志稽疑》、楊守敬、熊會貞的《水經注疏》等等，無不泛及群書。

因此，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需要與所有文史學者一樣，盡可能具備比較全面的歷史文獻學素養，特別是目錄學知識，這樣才能按照研究题目的需要，得心應手地運用相關文獻。從這一意義上講，包括歷史地理學者在內的所有文史學者，不管研究什麼問題，對經、史、子、集各部各類各時代的基本文獻，都應當有所瞭解，甚至可以不必在意和區分各自學科的專門文獻。不過，從總體上看，對於不同的學術領域而言，不同類型的歷史文獻，其應用的廣泛性和普遍性畢竟還是有所差別，而研究者熟悉和掌握各類歷史文獻，也是要由最核心的基本典籍逐漸向周邊擴展，因此，不能不根據輕重緩急，區分先後，次遞推延。

在這一認識和利用文獻的過程當中，按照現代學科的需求選編彙印相關文獻，會為研究者提供很大方便。尤其在歷史地理學研究領域，由於很多研究內容，需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手段，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是來自地理學等自然學科，搜集史料往往會遇到諸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因此，充分彙輯經、史、子、集四部書籍當中的各類基本地理典籍，也就變得愈為重要。在這方面，過去譚其驤先生主持編輯出版《清人文集地理類彙編》，已經做出良好的表率。只要出版印刷能力允許，循此路徑，彙編出版更多的歷史地理文獻，當然會對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起到更大的推進作用。

要做好這樣的編選工作，需要主事者具備良好的歷史文獻

學素養和對學術的負責精神。李勇先生是歷史文獻學科班出身，後來轉而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尤為偏重研究歷史地理學文獻，著述頗豐，有能力、有魄力來編印這部《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以廣泛彙輯各種類型的歷史地理文獻。期盼並相信這部書的出版，能夠為廣大歷史地理學者利用相關文獻提供極大的便利。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辛德勇

二〇〇八年九月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前言·李勇先

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文獻典籍十分豐富。在這些卷帙浩繁的文獻中，歷史地理文獻就佔了相當大的份量，一大批優秀的地理名著流傳至今。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是一部傑出的地理著作，是對北魏以前我國地理學的一次系統總結。又如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它「體例亦為最善，後來雖遞相損益，無能出其範圍」者，對後世地理志的編纂產生了重大影響。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繼承了《元和志》和《華陽國志》的傳統，在記述各道、府、州、縣時，創造性地增加了各地風俗、姓氏、人物、藝文、土產等人文和經濟內容，使這部書成為歷史與地理相結合的典範。

在中國歷代文獻中，除了專門的地理著作以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地理文獻專論或專篇，這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內容：

一是歷代學者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對一些重要經史文獻進行專門研究，包括對經部文獻《詩經》、《尚書》、《春秋》、《四書》、《爾雅》，史部文獻《國語》、《戰國策》、《資治通鑑》、《元秘史》等的研究。如《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其內容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還有古人對大自然等許多地理現象的認識，為人們研究這一時期自然與人文地理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歷代學者除對《詩經》地理內容加以注釋外，還進行專書研究，如宋王應麟《詩地理考》、清朱右曾《詩地理徵》、桂文燦《毛詩釋地》、尹繼美《詩地理考略》等。又如《春秋》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現存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經及其三傳中地理內容相當豐富，尤其是《春秋左氏傳》，記載了許多有關自然與人文地理方面的內容。歷代研究《春秋》及其三傳的地理

專著甚多，如晉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等等。司馬光《通鑑》也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因該書記載了大量的地理內容，故後世學者多對此進行專門研究，其代表作首推宋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該書以《通鑑》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為糾紛，而險要阨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為有國者成敗之鑒，因各為條例，釐定成編。該書以《通鑑》地理內容為主綫，以歷代重大歷史事件和關鍵地區攻守得失來論述地理形勢，疏理地理沿革，舉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參以樂毅、王朴之崇論宏議，稽《左氏》、《國語》、《戰國策》、《通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為興替成敗之鑒。該書徵引廣博，資料翔實，考證精確，雖名為《通鑑地理通釋》，實為泛考古今地理，並不專釋《通鑑》。王應麟除著有《通鑑地理通釋》外，還有《通鑑地理考》一百卷，惜已不傳於世。自《通鑑》問世後，歷代又將《通鑑》改編成紀事本末體、綱目體等體裁的著作，後世學者對此類著作中的地理內容又加以考證和注釋，如清張庚《通鑑綱目釋地糾謬》、《通鑑綱目釋地補注》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子部類文獻中的《山海經》和《穆天子傳》。《山海經》是傳世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也是先秦三大地理著作中規模最大、記述內容最豐富的一部。《山海經》主體部分《山經》以山岳山系為綱，敘述了各地山名、山數及走向、相距里數，河湖及流向，以及土壤、動植物、礦物、民俗、物產、貢賦、交通、民族等自然、人文地理方面的內容，《海經》敘述自遠古以來各種事物或現象，包括山川、地方、動植物、礦物、民俗、方國部族、世系、人物、

古迹、怪異、神話、傳說、神祇等等。《山海經》原有圖，而文字是對圖的敘述或說明。對於該書的性質，在宋代以前，學者多將此書當作地理博物書來看待，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將此書列入史部地理類。到了明代，胡應麟認為《山海經》為「古今語怪之祖」，始將該書列入語怪類。清修《四庫全書》時，將其列入子部小說類。但從內容和體例等方面來看，《山海經》以山岳為綱，或以事物為目，圖文並茂，基本上涵蓋了地理、風俗、博物、古跡、人物、物產等方面的內容，具有地理總志的性質，為研究先秦時期歷史地理提供了珍貴史料。尤其是《山海經》對地理山川的記載有相當部分是絕無僅有的。譚其驤、史念海等先生利用《山經》的記載，並參考《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等其他相關文獻，考證出了黃河下游見於記載的最古的故道，並繪製成古代黃河下游水系圖，這進一步提升了《山海經》的歷史地理學價值。後世注釋《山海經》著作甚多，如明楊慎《山海經補注》，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畢沅《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等等。《穆天子傳》是我國第一部游記體地理著作，開創了我國豐富多彩的游記體地理撰述的先河。該書記述了周穆王游歷的經過，其所記載的內容包括沿途邦國、部族、山川、澤藪、大原、物產、禮制、民俗等，大多不見於其他文獻記載。由於人們對該書的價值認識不同，在具體分類上出入較大，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藝文略》、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將其列入史部起居注類，宋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明正

統《道藏》將其列入傳記或雜傳類，清《四庫全書總目》始將其從史部列傳中剔出，而列入子部小說類，以後的一些目錄書多采用此說。但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來看，《穆天子傳》與《禹貢》、《山海經》一樣，都是先秦重要的地理著作。

此外，在輯佚類文獻中，收錄了不少已散佚的地理文獻。中國古籍浩如煙海，散失驚人。從宋代開始，就已經開始重視輯佚古籍，尤其到了清代，以乾隆時期輯佚成就最大，並發展成為一門專門之學——輯佚學，湧現出了一大批輯佚名家，如王謨、馬國翰、黃奭等等。在對歷代地理文獻，尤其是漢唐地理文獻輯佚方面，以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黃奭《漢學堂叢書》、陳運溶輯《麓山精舍叢書》等為代表。

二是歷代經、史、子各類文獻中所包含的專門記載地理的篇章。如經部《尚書》中的《禹貢》篇、《周禮》中的《職方》篇、《爾雅》中的《釋地》、《釋丘》、《釋山》、《釋水》篇、《荀子》中的《地員》、《地數》、《度地》、《地圖》篇、《呂氏春秋》中的《有始覽》，以及史部別史、載記、雜史、史評、政書、目錄、子部儒家、法家、兵家、農家、天文術數、雜家類著作中都有許多專門論述或記載地理的篇章。

《尚書》是中國古代儒家的重要經典，《尚書》中的《禹貢》篇，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科學價值很高的地理總志的著作，被公認為世界地理名著，是研究中國上古時期經濟、地理、社會的非常重要的文獻，被視為中國地理學之祖，奉為「萬世不易之書」。儘管《禹貢》全文僅一千一百餘字，但歷代學者研究成果却十分豐富，如宋毛晃《禹貢指南》、程大昌《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山川

地理圖》、清胡渭《禹貢錐指》等等。

史部政書類「十通」、歷代會要、明清會典以及雜考類著作中，都有專門記載地理的專篇，內容十分豐富，學術價值甚高。如杜佑《通典》是我國第一部典章制度體通史。該書博取經史文集，每事以類相從，會通古今，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通典》中的《州郡典》記載歷代疆域政區沿革，并由近及遠，追溯各地區行政建置的演變，條理清晰，具有極強的歷史地理觀念。《州郡典》還首創「四至八到」體制，為歷代地理總志和地方志所借鑒。鄭樵《通志》雖然是一部斷代體史書，但其所創立的「二十略」是全書精華所在，具有政書性質。「二十略」中的《地理略》、《都邑略》則屬於地理專篇。《地理略》按照九州劃定的自然地理區域，依次記述歷代建置沿革、境內名山大川、貢賦物品、地方特產，具有重要的地理學價值。尤其是「二十略」中的《都邑略》，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歷代都城選址和變遷、探討古代政治與地理關係的專篇，並因此開創了一種新的體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又一部典制體通史著作。該書貫通古今，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與《通典》相比，門類更加齊全，取裁更加精審，體例更加嚴謹，資料更加詳贍，持論也較為平允。《文獻通考》中的《輿地考》屬於地理專篇。《輿地考》是「三通」地理篇中較好的一篇，可補其他史志之不足。不僅記錄地理情況，而且還能提出一些新的見解。自「三通」以後，清乾隆年間，仿「三通」體例編修《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近代劉錦藻又撰《清朝續文獻通考》。「續三通」、「清

三通」的州郡典、地理略、輿地考等既是該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是重要的地理專篇。

又如類書是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分類或分韻資料彙編，是供人們尋檢、徵引的工具書。由於它博採四部，且分門別類，便於查找各類資料，對考鏡事物源流、校勘、輯佚古籍等都有重要的價值。在歷代類書中，很多都有地理專篇。如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分爲天、歲時、地、州、郡、山、水等四十六部，其排列順序基本上按天、地、人、事、物等五個方面來編纂。以後的類書雖然分類門目時有增減，但大體皆不出其範圍，故該書體例爲後來類書所效仿。明章潢《圖書編》分爲經義、象緯曆算、地理、人道四類。《子史精華》分爲天、地、帝王、文學等三十部。可見地理部分在古代類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些類書中的地理部分不僅有文字敘述，而且還配有地理圖。如宋陳元靚輯、元無名氏增補的《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三就有《歷代輿圖》、《歷代國都圖》、《大元混一圖》以及分省地圖，其中《歷代國都圖》反映了宋代的行政區劃，而卷四《都邑》反映了元代區劃建置，這對研究宋元沿革地理具有重要的價值。又如元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首有十四幅地圖，首幅爲全國地圖，其餘十三幅爲分省區圖，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較完整的分省地圖集。其他如明陳仁錫《八編類纂》、王圻《三才圖會》等類書中都有許多地圖。不僅如此，一些重要的地理著作也因類書才得以保存下來，如現存最完整的元代全國性地理總志《大元混一方輿勝覽》有賴元泰定年間刊劉應李輯所編的《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一書保存下來。一些類

書如宋晏殊《晏元獻公類要》現已成爲孤本，而其中地理部分的史料價值也就顯得格外珍貴。尤其是清朝前期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類書。全書一千卷，一億六千萬字，分爲六大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餘部，其中的《方輿彙編》下分爲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每典之下又分爲若干部。《方輿彙編》彙集了衆多歷代地理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此外，史部別史、載記、雜史、史評、史鈔類文獻中也有專門的地理或輿地篇章。如《明書》、《晉紀》、《宋史新編》、《越嶠書》、《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二十一史論贊》、《十七史詳節》、《史緯》等等。史部目錄類文獻、二十五史中的藝文志、經籍志以及其他文獻中的藝文部分，對地理著作及其作者、版本的著錄也非常豐富，子部儒家類文獻中也有一些地理篇章。尤其是子部農家、兵家、天文數術家特別重視地形、地勢在農作物種植、行軍打仗、天文分野、堪輿選址等方面的具體運用，故在農家、兵家、天文術數家等著作中有許多專門論述地理的篇章，如《授時通考》、《握機經》、《孫子參同》、《武備志略》、《璿璣遺述》、《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地理大全》等等。同時，子部雜家類如《來瞿唐先生日錄》、《鴻苞》中也有豐富的地理內容。

自宋元以來，一些學者開始重視對地理文獻的彙集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元陶宗儀輯《說郛》中收錄了一些地理文獻，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民國胡思敬輯《問影樓輿地叢書》，更是專門彙集地理文獻的叢書，民國以來所編輯的《二十五史補編》、《二十五史三編》、《二十四

史訂補》等也彙集了尤其是清代以來學者對歷代正史地理研究成果。誠然，這些叢書在一定程度上為人們從事地理研究提供了許多方便，但仍有許多散見的地理篇章沒有得到很好的輯錄和整理，使得長期以來人們對這些過於分散、不易檢尋的地理文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更談不上有效地去利用它進行學術研究。因此，對這些分散的地理文獻進行一次較全面、系統的輯錄和整理，就成了歷史地理工作者的一項緊迫而艱巨的任務。有鑒於此，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致力於地理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經過長時間的搜集和輯錄，編成了《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該叢書共分為十編，包括《禹貢集成》、《尚書禹貢篇集成》、《詩禮春秋四書爾雅地理文獻集成》、《通鑑類地理文獻集成》、《政書類地理文獻集成》、《目錄類地理文獻集成》、《輯佚類地理文獻集成》、《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山海經穆天子傳集成》、《子史雜集類地理文獻集成》等。

需要指出的是，集部文獻也蘊含極其豐富的地理資料，涉及到政區沿革、政治、經濟、水文、旅遊、交通、民族、宗教地理等方面的內容，既有對地理事物的考辨論說，又有對地理現象的記錄和陳述。古代一些學者除了有自己專門的地理學著作以外，還有許多地理專篇保存在他們的文集之中，如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船錄》、《驂鸞錄》、《攬轡錄》、周必大《吳郡諸山錄》、《廬山錄》、《廬山後錄》、《乾道庚寅奏事錄》、《癸未歸廬陵日記》、《壬辰南歸錄》、《泛舟游山錄》等等。由於集部中的地理篇章過於分散，給從事歷史地理或其他相關研究的學者帶來諸多不便。中國著

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嘗就清人文集編成《清代學者地理論文目錄》，後來又組織復旦大學部分專家學者就清人文集中的地理文獻進行分類彙集，並加以標點整理，結集成三百餘萬字的《清人文集地理類彙編》，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並為其他朝代文集類地理文獻的編纂起到了很好的典範作用。對於歷代集部中的地理文獻，我們將在今后編成《集部類地理文獻集成》，作為《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續編》出版。

我相信，隨着《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的問世，必將進一步推進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深入開展。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印行緣起

中國歷史地理學源遠流長，地理文獻十分豐富。自從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地理學著作《禹貢》問世以來，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地理學名家和著作，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宋代王象之《輿地紀勝》，明代徐宏祖《徐霞客遊記》、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記要》等等。在傳統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中，這些地理文獻大多收錄于史部中的地理類。但在史部其他門類以及經部、子部和集部相關文獻中，還有很多重要的地理文獻著作或論文，而這一部分地理文獻由於相當分散，往往被人們所忽略，更談不上充分利用這些資料從事研究工作。因此，對史部地理類以外的地理文獻進行一次較全面、系統的蒐集和整理，編成一部集資料性和工具性于一體的、具有很強實用性的文獻叢書，並予以出版，是歷史地理學界長期以來翹首以盼的大事，而這一工程即將由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完成。正如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所說，四川大學

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纂的《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完成了本學科這項最巨大的資料彙編工作，其價值不言而喻。」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與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精誠合作，對中國傳統文獻中史部地理類以外的地理文獻進行了較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並按專題或類別編成《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共分為十編，包括《禹貢集成》、《尚書禹貢篇集成》、《詩禮春秋四書爾雅地理文獻集成》、《通鑑類地理文獻集成》、《政書類地理文獻集成》、《目錄類地理文獻集成》、《輯佚類地理文獻集成》、《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山海經穆天子傳集成》、《子史雜集類地理文獻集成》，為人們充分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同時也便于查閱和檢索。我們深信，《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的出版，必將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工作構建起一個相當完備的文獻資料庫，也必將推動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深入開展。

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

凡例

一、《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輯刊》主要輯錄、彙編散見於各類文獻中的地理篇章，並按照一定的體例和方法進行編纂。該叢書第一次對歷代地理文獻進行較全面、系統的輯錄和彙編整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也是一部使用和查尋方便的資料工具書。

一、《輯刊》收錄的地理文獻上起先秦，下至清末民初。

一、《輯刊》共分為十編，包括《禹貢集成》、《尚書禹貢篇集成》、《詩禮春秋四書爾雅地理文獻集成》、《通鑑類地理文獻集成》、《政書類地理文獻集成》、《目錄類地理文獻集成》、《輯佚類地理文獻集成》、《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山海經穆天子傳集成》、《子史雜集類地理文獻集成》，每編之下或分若干小類。

一、每編中的地理文獻大致按照作者時代先後順序編排，或細分各類之後再按作者時代先後順序排列。

一、在文獻輯錄方面，我們盡量選擇內容較完整、書品較好的版本，以便讀者使用。

一、在文獻內容方面，一是全書收錄，一是輯錄原書中的相關地理篇章。但由於史部正史類相關地理研究成果已彙編於《二十五史補編》、《二十五史三編》及《二十四史訂補》之中，故不再編入《輯刊》。《古今圖書集成》已屬常見書，其中的《方輿典》也不納入《輯刊》收錄範圍之內。

一、《輯刊》最後，將附四角號碼和拼音、筆畫三種書名、著者索引，以便讀者檢索使用。

一、《輯刊》中收錄的文獻，均在篇章頁上標明書名、作者及所採用的版本信息，以便讀者對該書有一個基本瞭解。

類書類地理文獻集成

序·李勇先

類書是將有關古代事物的記載從其他典籍中輯錄出來，按照天、地、人、事、物等分爲若干門類，每類之下又分若干子目，隨類相從，分別附於各門類及其相關子目之下，以供人們查閱和使用的一種工具書。有人認爲先秦時期的《爾雅》實開我國類書之先河，但學術界普遍認爲三國魏時王象纂的《皇覽》才是我國最早的類書。當時魏文帝曹丕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四稱：「類事之書，始於《皇覽》。」因而《皇覽》被人們譽爲千古類書之權輿、中國類書之祖。《皇覽》至唐初就已失傳。隨着中國古籍的日益豐富，客觀上需要有一種便於檢索查閱的工具書。而唐以後科舉興盛，士子應試迫切需要便於查閱使用的類書；歷代帝王、文人墨客寫詩作文，崇尚駢麗，講究辭藻，重視用典，徵引故實，也需要便於

檢索和查閱具有工具書性質的類書；同時，歷代統治者出於政治和文化統治的需要，也不遺餘力地支持大型類書的編纂，這就使得我國古代類書越來越興盛，規模也越來越大，尤其是在學術文化繁榮和國力強盛的時期更是如此。而我國發明的造紙術和雕版、活字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又爲大型類書的編纂和流傳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類書編纂的發軔時期，爲後來類書編纂確立了基本的規範和體例。特別是在齊、梁時，受魏晉文風的影響，作文喜用駢句對偶，注重文彩，從帝王到文士都對摘錄華麗辭藻和歷史典故類的圖書特別感興趣，以備平時行文作賦之用，於是出現了一大批類書，如晉陸機《要覽》、劉宋何承天等合《皇覽》、南齊東觀學士奉敕撰《史林》、梁蕭琛《皇覽抄》和徐勉《華林

《通志》、陳張式《書圖泉海》、北齊祖珽《修文殿御覽》、北魏崔安《帝王集要》等等，其中以梁徐勉《華林遍略》（七百卷）、北齊祖珽《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較為有名，從其卷數可知這兩部類書的規模都比較大，可惜同其他類書一樣都難免失傳的命運，僅在《鳴沙石室佚書》中還能見到《修文殿御覽》的殘卷。

隋唐時期，類書編纂已初具規模，隋代有杜公瞻《編珠》、虞綽《長洲玉鏡》，隋末唐初虞世南《北堂書鈔》。《北堂書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保存較完整的一部類書。唐代有杜嗣先《兔園策府》、歐陽詢《藝文類聚》、姚士廉《文思博要》、許敬宗《東殿新書》、張昌宗等《三教珠英》、徐堅《初學記》、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顏真卿《韻海鏡原》等等。尤其是《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事類集》被稱為「唐代四大類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到了宋代，類書的編纂已日臻成熟，出現了一大批官修私編的類書。除被稱為「宋初四大書」的李昉《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和王欽若《冊府元龜》而外，還有晏殊《晏元獻公類要》、林駟《源流至論》、高承《事物紀原》、王應麟《玉海》、祝穆《事文類聚》、章如愚《群書考索》、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佚名《錦繡萬花谷》、陳元觀《事林廣記》等等。在宋代，類書的編纂體例更加完善，編纂方法也日趨成熟，如王應麟《玉海》不只是簡單的排比和羅列資料，而是綜敘故實，條貫源流，考證訛誤，辨析異同，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稱該書「纂次詳備，博而有要，體例與他類書迥異」，在編纂方法上得到了創新。同時，宋代類書內

容也更加充實，除大量綜合性類書而外，還出現了專收詩文、小說、四六文、賦文等專科性類書。在金、元時期，也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類書，如金完顏綱等奉敕「編類陳言文字」等等。

明清兩代，類書編纂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出現多部具有集成性的特大型類書。如明成祖時解縉等奉敕編纂的《永樂大典》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類書。此外私人編輯的類書也非常多，可稱得上歷代之「最」。比較著名的有彭大翼《山堂肆考》、陳耀文《天中記》、馮琦等《經濟類編》、郎瑛《七修類稿》、王圻《三才圖會》、章潢《圖書編》等等。到了清代，統治者特別重視類書的編纂，官修類書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如陳夢雷、蔣廷錫等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類書，此外還有張英《淵鑒類函》、何焯《分類字錦》、張玉書《佩文韻府》、吳士玉《駢字類編》、允祿《子史精華》等，都是御定編纂規模宏大的類書。此外，清代私修類書也不少，但規模一般都很小，如陳元龍《格致鏡原》、潘永因《宋稗類鈔》等等。

明清類書的編纂無論是規模，還是內容上都已達到極至，後人已很難望其項背。但是，隨着乾嘉時代朴學的興起，考據之風盛行，學術風氣發生了很大轉變，士大夫視編纂類書為不屑之學。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我國正值內憂外患，國力衰弱，統治者無暇顧及文化事業，從而失去了編纂大型類書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到了清末光緒年間，清政府又廢除了科舉制度，再加上西學東漸對我國傳統文化觀念所造成的衝擊和影響，我國類書編纂逐漸走向衰落。儘管如此，我們的祖先仍然留下了十分豐富的